

人物文萃

赵利栋 / 编撰

風雲人物

钱玄同

Qianxuantong

刘半农

Liubannong

主编：丁守和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五四风云人物文萃



钱玄同

(1887—1939)



刘半农

(1891—1934)

赵利栋 编撰

主 编：中国现代文化学会 丁 守 和

副主编：马 勇、左玉河、

编委会：丁守和、耿云志、杨天石、唐宝林、

马 勇、左玉河、李玉刚、金以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四风云人物文萃/丁守和主编;赵利栋编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5

ISBN 7-80153-117-5

I.五… II.①丁… ②赵… III.①五·四运动(1919)-历史人物-生平事迹②政论-中国-现代-文集③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Z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9804 号

书 名:五四风云人物文萃 钱玄同 刘半农

主 编:丁守和

编 撰 者:赵利栋

责任编辑:宋桂芳 石 英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铁建印刷厂

字 数:1146千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8.875

印 数:1-1000

印 次:2005年5月第1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53-117-5/G·072

定 价:全套232.20元(全九册)

五四精神与现代化

——《五四风云人物文萃》序

丁守和

五四运动 86 年了。在它的周年或若干周年,总是有纪念活动。虽然不同时期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总是不会变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愈益显示出它的伟大意义和光辉。

五四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又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正是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愚昧思想,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特别是青年的觉醒,促进了爱国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一系列新的条例、章程或命令,并制定民元约法,宣布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由于政权很快落入袁世凯手里,并未能改变中国的旧社会制度,宪法、国会成为军阀、官僚、政客手中的玩物和争权夺利的工具。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下,人民倍受专制之痛苦,腐旧思想布满中国,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载入宪法”,之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相继发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等发动了一场反对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它从一创刊就揭示出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并用来进行反封建的启蒙。当时广大国民仍然处于蒙昧状态,为封建主



**WU SI
FENG YUN**



义的愚昧思想所束缚，因而急需大张旗鼓宣传民主和科学，唤起国民的觉醒。

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把希望首先寄托于青年。他们向青年大声疾呼，提出六项迫切的要求，那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就是说，用民主科学精神唤起青年觉醒，解放思想，摆脱封建愚昧思想的束缚，向现代化前进。

他们指出，封建社会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箝制思想，限制自由，阻碍个性发展，要“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接着又提出：“法律上之人权平等，伦理上之人格独立，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以及“经济上之财产独立”。他们还提出“用科学解释宇宙之谜”，“以科学说明真理”。

《新青年》接着又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以及文学中的“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黑幕大观”之类货色。主张文学革命，反对陈腐的旧文学，提倡新鲜、活泼、抒情的新文学、国民文学、平民文学，反对八股文言文，提倡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反对封建迷信和鬼神邪说，反对偶像崇拜，鼓励人们解放思想，争取自立自主自强。旧习俗中的男尊女卑、续婢纳妾、包办买卖婚姻、宗法思想等，无不受到冲击。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以“群道臣节、名教纲常”为核心的旧文明受到很大破坏；而以民主自由和科学为支柱的新文明勃然兴起，犹如一股春风吹向中华大地，发生很大影响。一些封建守旧势力深感畏惧，于是对《新青年》的攻击迫害接踵而至，他们提出要以“正统”的政治思想道德进行“统整”，并企图借助封建军阀势力实行暴力镇压。

但是，《新青年》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屈服，也没有退让。他们明确表示，要坚持拥护“德赛两先生”，进一步

宣传民主和科学,表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无畏决心。在教育界、学术界、舆论界,尤其在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形成“新旧思潮之大激战”,很是引人注目。

随着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激发起广大青年对旧社会制度和腐败统治的不满,并且增强了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爱国意识。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战败国德国原在山东攫取的种种特权转让给日本,直接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巴黎和会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人们掩不住的心头愤怒,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学校的数千名学生走出课堂,涌向街头,举行集会,呼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拒绝巴黎和约”,“誓死收回青岛”等口号。这声音迅速传到各地,形成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许多工人、市民也参加进来。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已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五四运动成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文化运动很快转入救亡运动,广大革命青年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无畏的革命精神。在这以后,中国人民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压迫,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在革命年代需要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在建设年代同样或者说更需要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邓小平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的传统多,民主法治的传统很少。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各项制度,法律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他还说,在我们的党政机关和干部中存在的特权、家长制、以权代法、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所以,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我国现代

WU SI
FENG

五四风云

化事业的顺利发展。

在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等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创办刊物,鼓吹新思潮,评议时政,倡导思想革命、伦理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甚至亲身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爱国运动,成为五四时期国人瞩目的风云人物。他们是当时中国先进青年敬仰的思想界的领袖,他们的言论成为指导广大青年冲破旧思想、旧伦理的束缚、解放久受压抑的个性、追求光明和进步的思想武器。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些饱含激情、思想深邃的文章时,不能不为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热情、无畏的抗争精神、敏锐的思想洞察力而拍案叫绝。他们那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作为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物质载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遗产。在五四运动86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把这些活跃于五四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的活动和思想再现出来,无疑是我们对五四运动的一种较好的纪念方式。面对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新格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尤为重要。思想解放,科教兴国,不断增强国家实力,才能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发扬五四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精神,继承五四光荣传统,我们编选了这套《五四风云人物文萃》。五四时期是新人辈出的时代,在思想解放大潮的冲击下,我们从活跃在五四思想文化界众多的风云人物中,精选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吴虞、易白沙、刘半农、钱玄同、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将他们在五四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编成9本小书,作为《五四风云人物文萃》的第一批出版。当然,如果条件允许,我们把在五四思想文化界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物的文著继续编选出版。因时间仓促,在编选过程中难免有遗漏或错误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2005年5月4日

目 录

钱玄同 刘半农小传	赵利栋(1)
选学妖孽 桐城谬种	钱玄同(17)
文学改良与用典问题	钱玄同(19)
我之文学改良观	刘半农(27)
世界语与儒学	钱玄同(43)
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	刘半农(50)
论应用文亟宜改良	钱玄同(60)
关于华文横式及古典小说的讨论 ...	钱玄同(66)
应用文之教授	刘半农(74)
句读符号	钱玄同(84)
《尝试集》序	钱玄同(86)
王敬轩(钱玄同)君来信 ... 王敬轩(钱玄同)	(93)
复王敬轩(钱玄同)书	记者(刘半农)(99)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钱玄同(115)
斥《灵学丛志》	钱玄同(122)
再斥《灵学丛志》	刘半农(131)
随感录三则	钱玄同(135)
文学革新与青年救济	钱玄同(138)
今之所谓“评剧家”	钱玄同(140)
“作揖主义”	刘半农(143)
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	钱玄同(148)

ACY 82/05
— 1 —

WU SI
FENG YUN

五四 风云

随感录又三则	钱玄同(151)
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	钱玄同(155)
“她”字问题	刘半农(163)



钱玄同 刘半农小传

赵利栋

钱玄同，1887年9月出生于浙江湖州一家书香门第。原名师黄，字德潜，又曾名怡。在日本留学时，因接受民族革命思想，立志排满后，改号汉一，后改名夏。别号中季，亦季。五四运动前，改名玄同。在古史辨运动中，又号疑古，有时自称疑古玄同。父亲钱振常，曾任清朝礼部主事，后任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长兄钱恂，与钱玄同异母生，比钱玄同大三十四岁，曾任清政府驻日、英、德等国使馆参赞或公使。二人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素。钱玄同四岁入学，由其父亲自教读。自幼即熟读《五经》、《说文》、《尔雅》及《史记》、《汉书》等著作，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底子。1902年，钱玄同受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等刊物的影响，在思想上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主张。1903年冬，钱玄同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1904年，又读了章太炎的《诂书》、刘师培的《攘书》及其它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转而赞成排满革命，并毅然剪辫，表示“义不帝清”。1905年12月，钱玄同随其兄赴日，开始学习日文。当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为活跃的一群，各种主义、思潮都有它的提倡者和追随者。钱玄同最初崇信国粹主义，“对于一切‘欧化’，都持‘诃拒之’的态度。”到日本以后，钱玄同又对无政府主



WU SI
FENG YUN



义发生兴趣，自1907年秋起，他多次参加张继、刘师培二人召集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在那里，听过关于克鲁泡特金学说的演讲，也听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在东京期间，章太炎举办国学讲习会。自1908年4月起至1910年5月归国止，钱玄同与鲁迅、周作人、朱希祖等一起，听章太炎讲《说文》、《庄子》、《汉书》《文心雕龙》等著作，达二年之久，在思想上深受章太炎的影响。

1910年，24岁的钱玄同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浙江海宁、嘉兴、湖州等地任教。武昌起义后，清王朝覆灭。钱玄同认为正是光复汉族旧物的时候了。于是他参考《礼记》等书，及黄宗羲、任大椿、张惠言、黄以周等诸家关于深衣的考证，做了一部《深衣冠服说》，并照所说的做了一套。1912年3月，钱玄同出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科员，便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昂昂然上办公所去，结果是赢得同事们的哄笑，朋友间从此传为笑谈。1913年9月，钱玄同开始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兼任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1916年9月起，开始用玄同一名。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从二卷一号起改名《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组织掀起“文学革命”。钱玄同很快表示赞同，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期上刊出钱玄同致陈独秀的公开信，第一次提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的指责。这是钱玄同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标志。自此以后，钱玄同全面展开了对于中国旧文化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几乎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比。他指责“选学”、“桐城”两派在内容

上“迂谬不化”，在形式上只能称为“高等八股”，而在影响方面“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秽书画”。

钱玄同在五四期间的文章给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活力与战斗性。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说“《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意见还很简单，只是想将文体改变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话，别的再没有高深的道理。当时他们的文章也还是都用文言做的，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加入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旧派真正有力的思想交锋，钱玄同与刘半农合演了一场“双簧戏”。1918年，钱玄同作为《新青年》编辑曾邀鲁迅为《新青年》写稿，如《狂人日记》即是在钱玄同推动下而作的。

对于应用文的改良，钱玄同提出要规定语法间的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应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等意见，不少在后来都得到实行。钱玄同在讨论应用文改良的文章中，敏锐地看出了旧文学与旧体制、旧思想的关系。钱玄同指出，中国二千年来语言与文学相分离的缘故，“第一给那些独夫民贼弄坏的……第二给那些文妖弄坏的。”这是由于“那独夫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其实这些所谓尊贵的人，当面讲白话，究竟彼此也没有什么大分别，只有做文章，便可以实行那‘骄’‘谄’两个字。若是没有那种‘骄’‘谄’的文章。这些独夫民贼的架子，便摆不起来了，所以他们是最反对那质朴的白话文的。”而提倡白话

WU
FENG



文，“第一种文妖便不能搬运他那些垃圾典故，肉麻的词藻；第二种文妖，便不能去弄他那些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话文，那些会做文章的人必定渐多，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会做文章的名贵身份，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钱玄同认为只能用新文体表达新思想，“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

1918年3月，钱玄同作《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这是钱玄同五四时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在文章中他对于中国文化开出“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即“废汉文”的主张：“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钱玄同认为“儒家以外之学，自汉即被罢黜。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除晚周的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因此“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受其大害而不可救药。”钱玄同提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

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用道教妖言故。”进而钱玄同“爽爽快快地批判中国文字，“汉字”。他认为“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钱玄同废除汉文的主张曾引起社会上激烈的反对。针对“有人说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的论调，钱玄同于1918年答姚寄人的信中明确地说，“我意且以为国魂国粹要永远保存，甚或昌大之，力行之，则国真要‘不国’了。国粹中有‘生殖器崇拜’的道教，又有方相氏苗裔的‘脸谱戏’，遂至于1900年闹出拳匪的一种成绩来，国几不国；国粹中又有主张三纲五伦的孔教，到了共和时代，国会里选出的总统，曾想由‘国民公仆’晋封为‘天下共主’；垂辫的匪徒，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闹大逆不道的什么‘复辟’把戏”。他指出，“照这样做去，中国人总有一天被逐于文明人之外，第三次国将不国的日子，恐怕快要到了。所以依我看来，要想立国于二十世纪，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

钱玄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是“十分话说到十二分”，同时对于西方文化给予了全盘的肯定。他认

WU SI
FENG

为中国“现在百事不如人”，要人们正视现实，不要再自我陶醉于什么大同是孔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子发明的，共和是周公和召公发明的等等谬论，指出“人家的学问、道德、智识都是现代的，我们实在是太古了”，主张急起直追，“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中华民国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艺、科学，都该完全学人家的样子”。

自1918年下半年起，《新青年》同人逐渐分化，李大钊率先歌颂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1921年同人之间矛盾更为尖锐，编辑集体分裂。此后，钱玄同一面致力于古书辨伪的工作，一面掀起汉字革命的旗帜。这一年，钱玄同与顾颉刚通信，主张对中国传统的经书、史书、子书都要进行辨伪，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的序幕。这些信后来分别以《论近人辨伪见解书》、《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为题，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中。这几封书信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引导了古史辨运动的产生。正如顾颉刚所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近的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的启发与帮助。”

钱玄同强调，治古史要敢于“疑古”，打破治古史“考信于六艺”的传统见解，主张“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六经论》”，《尤其用极炽热的怀疑精神扫一番不可。”因此不但经学家的“家法”要破，就连“经”本身，也一律要“重新估定价值”。钱玄同看来一向被奉为神明的十三经不过是“不伦不类，杂七杂八的十三部古书而已”。“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

钱玄同特别指出，对于古学的研究必须以新知为

基础，“治古学，实治社会学也。断非可做保存‘国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钱玄同认为“一般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人的私产，不过西洋人作了先知罢了。中国人要是不甘于‘自外生成’，则应急起直追。研究现代的科学、哲学等等。若要研究‘国学’，尤其非懂得科学方法不行（这还是说‘起码’的话。其实不懂得现代的新文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经、史，其它类推）。我们今后对于‘国学’，只应该做‘整理国故’的事业，绝对的不应该再讲那什么‘保存国粹’，‘宣扬国光’这类废话了。”

钱玄同十分重视汉字改革，早在1917年钱玄同就加入国语研究会，成为国语运动初期的活动分子之一。1918年，提出废除汉文，代以世界语，后来发觉这个理想太高，逐渐转向国语罗马字研究。192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商议，决定把他们推行的新文字叫作国语罗马字，并在《国语月刊》里发刊一大册《汉字改革号》，以促进汉字改革运动的开展。钱玄同为此撰写长文《汉字革命》，系统论证了汉字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强调汉字改革必须“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而且应进一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钱玄同指责汉字难识、难记、难写，不便于表示语音，不便于输入新学、新理之原字，因此他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钱玄同任教授，同时继续参加国语工作。这年召

WU SHI
FENG GUO

开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定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委员会和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钱玄同是两会的成员之一。他提出增修新式标点符号的意见书，建议增加隔号、音略号、略字号和连字号等。同年9月，参加由刘半农发起的语音学者团体“数人会”。1928年，教育部聘钱玄同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常委。同时，在北平设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钱任纂著部第一组国音大辞典股主任。1932年主持编成《国音常用字汇》，经教育部公布定为发音标准。

1936年，日本加紧侵略华北，钱玄同与北平各大学教授共同发表宣言，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中日外交公开、不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等七项主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师大迁往西安，钱玄同因病留北平。在此期间完成了《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校。1938年，钱玄同复名钱夏，表示不作日伪的顺民。1939年1月17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

刘半农，1891年5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城里西横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原名寿彭，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世以字行。笔名有寒星、范奴冬；堂号有含辉堂、灵霞馆、桐花芝豆堂、双凤凰斋等。父亲刘半珊是秀才，曾做过塾师，后创办翰墨林小学，从事新式教育工作。刘半农四岁时，由其父开蒙，六岁入塾。后入翰墨林小学、常州府中学堂接受新式教育。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遂辍学从事革命，“北走靖江，以书牒翻译之事佐戎幕”。次年春，因不满于革命军队的混乱，回到江阴，后转赴上海谋生。

在上海，加入新剧团体开明社，任文字编辑，并参加演出。1913年，经徐半梅介绍，任中华书局编